

猛龙》使我终身受益，到现在我的字的间架用笔还能看出痕迹”。

在习字与看画之余，汪曾祺不仅早已熟识父亲所收藏的那些石印和珂罗版印的画谱，还常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钻进裱画店去，看看那里的书画匠人如何做工。与他喜爱的齐白石一样，儿时的汪曾祺深受民间艺人的影响与滋养，他喜欢看街巷之间的画匠店现场作画，以及街上随处可见的民间美术工艺品，那些年少时关于书画的往事深刻地印在汪曾祺的记忆最深处，以至于无论他的小说或散文，言及书画，触目可及。他在《看画》一文曾记叙小时候去裱画店和画店看画的情景：“这家画店还画‘玻璃油画’。在玻璃的反面用油漆画福禄寿或老寿星。这种画是反过来画的，作画程序和正面画完全不同。比如画脸，是先画眉眼五官，后涂肉色；衣服先画图案，后涂底子。这种玻璃油画是作插屏用的……”描述之准确，观察之细致，印象之深刻，以至于几十年后都不曾忘却，娓娓道来。他曾自述：“我从小学到初中，都‘以画名’。初二的时候，画了一幅墨荷，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。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。我就读的高中重数理化，功课很紧，就不再画画。大学四年，也极少画画。工作之后，更是久废画笔了。”

的确，专业习画一直是汪曾祺一个未能实现的美好梦想。高中毕业时，他一度想投考当时在昆明的杭州美专而未果。直到四十多岁，他还想过要彻底改行，到中央美术学院从头学画。当然这些想法最终也未能成行，但并未阻止他继续作画、写字的热情。他有不少画家好

那些年少时关于书画的往事深刻地印在汪曾祺的记忆最深处，以至于无论他的小说或散文，言及书画，触目可及。

朋友，也有不少拥有极高美学品位的师友：沈从文老师的书法造诣，对古代美术的独到见解与丰富收藏，都处处启发和影响着自己的审美趣味。在沈从文先生引荐下，1948年，汪曾祺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历史博物馆职员，这让他有机会看了不少字画。他爱看画展，常带着家人去看绘画展览、故宫的字画等。据女儿汪朝回忆：父亲对故宫书画馆的展品非常熟悉，如数家珍。除了沈从文老师之外，还有好朋友黄裳，不仅是古籍收藏的大家，对于古代木刻版画，更是有着很深的研究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永玉，早在两人青年时期，就惺惺相惜，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黄永玉曾经在文章中回忆，那时候汪曾祺在上海郊区一个学校教书，每逢周末他就去汪的宿舍，汪给沈从文老师的信中描写

“黄永玉睡姿宛如婴儿”。还曾写文章赞扬：“黄永玉是个小天才……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，我想绝不蚀本。若不相信，我可以身家作保！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，他是第一个。”

高山流水，知音难寻，对于当年的黄永玉来说，有汪曾祺这样的知音，实值得终生怀念。那时候，每逢休息日，黄裳、汪曾祺、黄永玉三人必在一起，看电影，吃饭、聊艺术、说古今、谈时事……度过了一段极为难忘且珍贵的岁月。后来，黄永玉用他最拿手的木刻版画为汪曾祺的文集《羊舍一夕》绘制封面与插图，成为其木刻艺术的经典之作。汪曾祺晚年曾回忆这段往事：“当时出版社的同志从我这里往走拿书稿时，问：‘找谁插图？’我说：‘找黄永玉。’出版社的同志说：‘啊呀！这个恐怕有一定难度。黄永玉不一定愿意给搞。’我当时笑着对他说：‘他会答应的！你就说是我点名让他搞的。’结果出版社的同志找到黄永玉，说是有一本书想让他给搞搞插图，黄永玉拒绝了。后来一说是我点名让他搞的，黄永玉便欣然答应了下来。”而黄永玉回忆那段岁月时也曾这样说道：“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。我刻了一幅木刻，《海边故事》，一个小孩趴在地上，腿在后面翘着。他就说，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

下图：《蟹》纸本设色 34cm×34cm 1986年。

